

武心波 ▲ 著

“一元”与“二元”的历史变奏

——对日本“国家主义”的再认识



上海三联书店

“一元”与“二元”的历史变奏

——对日本“国家主义”的再认识

武心波 ▲ 著



上海三联书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一元”与“二元”的历史变奏:对日本“国家主义”的再认识/武心波著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8.

ISBN 978-7-5426-2932-6

I. 一... II. 武... III. 政治-研究-日本-现代 IV. D731.3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62072 号

“一元”与“二元”的历史变奏——对日本“国家主义”的再认识

著 者/武心波

责任编辑/钱震华

特约编辑/黎迦

装帧设计/鲁继德

责任校对/张大伟

出版发行/上海三联书店

(200031) 中国上海市乌鲁木齐南路 396 弄 10 号

<http://www.sanlian.com>

E-mail:shsanlian@yahoo.com.cn

印 刷/江苏常熟市东张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2008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2008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640×960 1/16

字 数/500 千字

印 张/39.625

ISBN 978-7-5426-2932-6/D·136

定价 54.00 元

谨以此书献给我的父亲武可斌
以告慰其殷殷期盼的在天之灵

序 言

中国国际关系学会副会长 俞正樑

这是一本成功地用理论对日本问题进行深度解读的优秀专著。

作者立足于日本现实问题,着力于理论阐发,立意深邃,富有哲理和创见。本书从社会与国家关系的角度,系统地阐述了日本“国家主义”一元政治进程的生成机制与发生原理,深刻揭示了日本历史演变的基本逻辑轨道,即一元与二元的循环往复的“历史结构”,从而构筑了关于日本历史宏大框架的理论体系。原创性是本书的主要建树和突出特色。

本书的理论创新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视角创新。作者强调东方社会的最基本单位是群体,这决定了东方社会的“群”的特性,以及其作用于国家的形式与方法。但是,作者并未停留于此,而是在此基础上将日本社会与东方社会做进一步的区分,以期挖掘出日本社会的特殊性,使得研究从东方视角推进到日本视角。日本社会和东方社会的“群体本位”的逻辑走向是一致的,但作为群体单位的形态、内涵则不同,构成日本社会的最基本单位是“氏族”,而非“家族”。“氏族本位”的社会构成导向,不仅承载着厚重的传统和文化积淀,而且在长期的生活实践中形成了能够传承和延续的价值观、思维模式、生活态度和行为方式,并进而成为特定场域中的生存技巧。只有承认并尊重这个“氏

族本位”社会的存在,才能真正认识和理解日本社会影响国家的方式与路径的独特性,才能真正把握日本社会与国家互动的规律和模式。这是本书主题研究的关键所在。

为此,作者对日本社会进行了富有创新性的理论建构,即将“社会转型”作为横向坐标,把“历史结构”作为纵向坐标,共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观察日本这个国家的社会坐标体系,从中来看日本(新)国家主义的成因与走向。

第二,原理创新。作者在发现日本独特的“历史结构”的基础上,进一步揭示了该“历史结构”在不同时期的基本内涵,以及结构本身在一定历史条件下自我转换的规律和演变路径。

作者指出,日本社会的历史结构的独特性在于,其内在节奏是沿着一元——二元——一元——二元——一元……这样一条逻辑轨道运行的。“二元”是“一元”分裂的必然结果,“一元”是“二元”解体的必然归宿。这是日本民族在漫长的历史演化中自然形成的“历史积淀”,是日本社会与国家长期互动的产物,它是后验的、物质性的,而非先验的、观念性的。

作者在系统地梳理了日本历史发展的脉络后得出的结论是,“一元结构”是日本社会的“非主流历史结构”。每当日本遭到外部力量冲击,危机降临岛国时,它总会高度聚合,趋向“一元”,即整个社会习惯性地收缩到国家层面,集聚资源和力量,在政治上向“国家主义”回归,寻求国家庇护,以应对挑战并求得新的发展机遇。因此,“一元结构”往往与“国家主义”相联系,“国家主义”成为其外在表现形式,同时也承载其基本内涵。

值得我们严重关切的是,天皇、“天皇制”与日本“国家主义”一元政治进程之间存在着一种隐秘性很强的内在逻辑关系,这决定了以氏族政治为本而又重视“国体”的日本政治,将无法在天皇缺位的情况下,单靠几位政治强人就能带领全体国民步入“新国家主义”一元政治进程中,缺乏天皇参与的“国家主义”的政治进程往往

是艰难乃至是不会成功的。因此,要防止日本重走“国家主义”的老路,就必须打消日本政治家试图动用天皇这一传统政治资源的念头。天皇一旦被请出了皇宫,日本的国家重建就步入歧途,而这是世人所绝不愿看到的。

危机条件下,“二元结构”自动地向“一元结构”转换的社会自我调节方式,几乎成为日本化解外部危机时的有效的自救方式和手段。但这种“一元结构”对日本而言并非常态,处于高度统一状态下的日本往往最为脆弱,极易受挫或失控,而且每次都以失败告终,从而成为一种短暂的激烈状态。一旦危机被成功地化解,内部的分裂力量就会趁势崛起,将日本再度带入分裂对立的状态,日本社会又会自动或被迫地返回到传统的二元生存状态中继续其发展,由“一元”回归“二元”。“二元结构”是日本社会的“主流历史结构”。对日本来说,这种状态更接近于一种“常态”,一种自然的松弛状态,也是一种持久而稳定的温和状态。“二元结构”作为日本社会的主流历史结构或占主导地位的强势历史结构,具有比“一元结构”更丰富的内涵,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具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和内涵。

在这里,作者清晰地勾勒出日本文明的独特性。日本虽受华夏文明的影响,但其“历史结构”在内涵上与大一统的中国相比则迥异——华夏社会“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日本社会虽然在形式与之相同,但在实际内涵上则相反,中国是“合大于分”,日本则是“分大于合”。而与西方多元社会相比,两者虽然在形式上非常相似,但西方的多元性建立在具有独立倾向的“个人本位主义”基础之上,日本却不同,它建立在具有天然分裂倾向的氏族共同体基础之上,形式上的相同难掩其实质上的相异。

第三,解读创新。作者用上述原理对日本历史上多次出现的“国家主义”政治进程进行了深度解读,揭示出“社会转型”与“历史结构”在一定条件下的自我转换这一社会巨变与“国家主义”一元

政治进程之间的内在因果关系。

作者纵观日本二千余年的历史,高度概括了三次蜕变。我们可以从中发现,日本真正处于高度一元化政治状态的时期不到四百年,其余大多处在二元分裂状态。“大化改新”(646年)是日本在华夏文明的冲击下为应对内外危机,第一次大胆地从多元状态中自觉走出,迅速确立了以天皇制中央集权国家为基本内容的一元化政治架构。不幸的是,一元化政治进程只持续了三百余年就被再度崛起的强大的氏族政治所中断,从此退出了日本古代政治的历史舞台。此后,日本便进入了长达八百年之久的分裂状态,并在最后的二百余年里确立起“幕/藩二元体制”。

到了近代,日本在西方文明的强烈冲击下,“幕/藩二元体制”迅速瓦解,陷入内外危机的日本很快实行了“明治维新”(1868年),告别了二元状态,再次转向以天皇制国家为基本内容的一元化政治进程,步入一元政治时期。但好景不长,统一后的日本大肆对外侵略扩张,最终招致历史性惨败。随着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向国民宣读《停战大诏》,这一仅持续了77年的一元政治进程就又走到了尽头,宣告终结。

战败后的日本,虽然表面上依旧维持着统一的政治局面,但在内里,随着天皇被迫退出权力中心,以及国家的被改造及其“矮小化”,日本实际上又回到了传统的分裂与分散的多元状态,政治权力是分散的、多元的,建立在分散与多元基础上的“政府/企业二元体制”,则是在巧妙地完成了对古代“幕/藩二元体制”在形式上的改造后,所成功实现的一次“历史蜕变”的产物。

在全球化浪潮冲击下,战后形成的“政府/企业二元体制”开始发生动摇,陷入了被不断解构的空前危机之中。二元的解体,必然导致日本自发地向一元回归,进入社会转型期。于是,整个日本社会出现了渴望向一元回归的政治冲动。尤其是随着企业这一共同体的解体(转而成为自由市场中的“经济人”),社会对新的共同体

的追求就自然而然地由企业转向了国家,开始对国家提出新的要求,期望重建国家这一传统的共同体。这样,日本社会便步入旧的“二元结构”模式逐渐解体,开始进入向“一元结构”意义上的“国家共同体”回归的历史转型期。当前,随着这一进程的不断加速,“新国家主义”政治倾向的抬头将是日本政坛不可避免的一大基本趋势,也是岛国整体一致的“自然选择”。但这一进程受外部全球化(目前突出地表现为世界金融危机)和内部政治经济诸因素的影响与制约,时而狂飚突进(如小泉),时而间歇盘整(如福田),表现形式复杂隐晦,曲折多样,但总体上处于一个量变加速的持续过程。

总之,作者从一元与二元的历史变奏中,对日本的“国家主义”进行了历史与现实的考察和分析,发现了导致这一政治进程在岛国日本形成、发展的独特的内在机制与活动规律,清晰而完整地描述出 21 世纪日本“新国家主义”的“临床表现”与未来走向,并对制约这一走向的诸多因素进行了前瞻性的分析和论述。这些具有原创意义的独到见解,不仅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而且还能引领人们对日本问题的本质理解和认识,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和现实意义。

2008. 10. 24

目 录

前 言	1
一 问题的提出与课题研究现状	1
二 逻辑框架与研究方法	13
三 对“核心概念”的界定与解释	18
四 基本思路	30
 第一篇 朝贡体系下古代中央集权国家的形成与失败	
第一章 由“多元”走向“一元”	39
第一节 多元社会:一个被遗忘了的孤岛上的落后民族.....	39
第二节 来自华夏文明的挑战与内外危机	59
第三节 大化改新与“一元政治格局”的形成	69
第二章 “一元”分裂,退回“二元”	82
第一节 氏族政治的复辟与“一元格局”的解体	83
第二节 幕府时期天皇制的象征意义	93
第三节 “幕/藩二元体制”的确立	103
第四节 置身于东亚“朝贡体系”中的日本	115
第五节 对古代日本“政治一元化”历史进程受挫的反思 ...	126

第二篇 主权国家体系下近代“国家主义”的形成与失败

第三章 “二元”解体,回归“一元”	144
第一节 西方文明的冲击与“幕/藩二元体制”的解体 ...	144
第二节 明治维新与回归“一元政治”	155
第三节 “天皇制”与近代民族国家的建构	171
第四节 统一与战争	191
第五节 “绝对国家主义”的盛行与“第一次战败”	205
第六节 结语	212
第四章 “一元”瓦解,重返“二元”	224
第一节 刺刀下的“国家再造”与“一元政治”的解体	225
第二节 “政府/企业二元体制”的形成	248
第三节 “新国家主义”一元政治进程的滥觞	278

第三篇 全球化背景下“新国家主义”的成因与表现

第五章 “二元”解体,逐渐回归“一元”	298
第一节 “第二次战败”	298
第二节 经济全球化浪潮的冲击	311
第三节 “企业共同体”的解体与蜕变	329
第四节 政府危机	347
第五节 向“新国家主义”一元政治进程的回归	378
第六章 回归国家主义“一元政治”的诸“临床表现”	395
第一节 “模型”与“视角”的确立	397
第二节 历史层面的纵向视角	402
第三节 制度层面的横向视角	421
第四节 精神层面的立体视角	457
第五节 “皇国史观”的传统视角	477

第七章 制约“新国家主义”未来走向的诸因素	497
第一节 “历史问题”的制约	498
第二节 “精神文化因素”的制约	516
第三节 日本国内政治中的诸“制约因素”	533
第四节 国际政治中的诸“制约因素”	558
第五节 结语	593
中文参考文献	608
日文参考文献	613
后 记	616

前 言

一 问题的提出与课题研究现状

自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以来,民族主义思潮在世界范围内的高涨,构成了当时国际政治的一大特色。发端于战后初期的日本“新国家主义”(或“新民族主义”),也在此背景下日趋活跃。冷战结束后,“新国家主义”已成为日本国内一股不可轻视的思潮。日本政治的右倾化,已引起了包括美国在内的亚太各国的严重关注和深深忧虑。2002 年 9 月,为了探讨日本“国家主义”的抬头对外交、安全保障、国内政治等方面所产生的影响,美国政府情报调查局汇集了政府内外的一些专家召开研讨会。研讨会于 9 月 26 日在华盛顿市召开。除了美国国务院、CIA、国防部等部门的专家之外,麻省理工的 John · W. Dower 教授等一批“可以称得上是”日本研究的“最高权威班底”(一名与会者语)也参加了该研讨会。会上各方专家以“关于日本的国家主义和同一性”为主题进行讨论,一些政府相关人士对日本的“国家主义”在会上也表示担忧。^①可见,如何看待日本的“国家主义”,以及日本是否会走“国家主义”的道路等等,已引起了世人的高度关注和警惕。

① 共同社华盛顿 2002 年 10 月 11 日讯。据称,情报调查局就三个值得忧虑的问题征求了与会专家者的意见。分别是:(1)战前日本的国家主义是否关系到目前的局势状况;(2)国家的同一性的想法是否对目前的日本外交以及安保政策造成影响;(3)未来将怎么样。

“国家主义”(Nationalism)是历史的产物,是伴随着近代民族国家的产生而产生的。学理上的“国家主义”更是一个难以辨析的概念,它有着相当庞杂多义的形式与内涵。它可以表现为某些人对共同疆域与文化传统的挚爱;对于政治独立与抗拒外敌的热望;或是黑格尔式的对作为历史最高阶段的“国家”的委身与崇拜。但一般意义上,“国家主义”这一范畴是针对两个参照系而言的。其一,以个人为参照系,指的是在主权国家内个人与国家的关系要以国家为中轴;其二,以全球为参照系,强调的是在国际社会中主权国家与人类共同体的关系要以国家为中心^①。

“国家主义”产生于文艺复兴时期新生资产阶级力量与传统教会力量的对立冲突中,霍布斯的《利维坦》是近代国家主义的代表作,是欧洲从教会权力中解放出来以后强化世俗国家权力的标志。“国家主义”思想最早可以追溯到马基雅维里、布丹、霍布斯等人的论述中,他们推崇国家理性,认为国家有独自的利益,为了追求和维护国家的利益,国家(或国家的代表)可以采取任何手段和形式。国家的权威是不证自明的,一切政治举措都是为了维护国家的利益,国家权力是至高无上的,不受任何限制。但国家主义作为一种成熟的意识形态还是出现于19世纪,主要是德国思想的结晶,但同时也是法国大革命刺激的产物,法国大革命把中央集权演化为现代政治的一个原则。赫尔德首先提出了国民精神或国民性的概念,他认为日耳曼一向具有并且将永远具有“确定的民族精神”。费希特把文化民族主义与国家主义结合起来,创发了一整套国家哲学,主张由国家提供人类经济、社会和精神上的种种需要。

其后,黑格尔在反思大革命中实现了国家的神学复辟,以黑格尔为代表的绝对主义国家观将这一思想发挥到了极点。黑格尔认

① 蔡拓:《全球主义与国家主义》,《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3月。

为,国家不是建立在物质上,而是建立在精神上、思想上的。“国家是绝对自在自为的理性东西,因为它是实体性意志的现实,它在被提升到普遍性的特殊自我意识中具有这种现实性。”^①黑格尔的国家理论视国家是个体的“最终目标”,只有在国家中并通过国家个人才能获得其真实的存在,因为只有在国家中并通过国家,个人才具有普遍性,个体从国家中找到其存在、义务和满足的真理,同时国家也构成神在外在世界中的实现或显现。在他看来,国家本身就是目的,个人(乃至社会)是为国家而存在的,国家是行进在地上的“神”,是个人生命的本质与生存意义之所在。萨拜因评论说,黑格尔的哲学给“国家”加上神圣的灵光,这在英国人看来也许纯属多愁善感,对德国人来说却表达了他们追求政治统一的真实而迫切的愿望。但无论怎样,西方国家主义从来没有取得过“独裁”的地位,而是沿着与外在的对立力量之间形成的二元化的道路行进的,并始终受到自然法观念、基督教势力与代议制体制的制约。

马克思从巴黎公社失败的经验教训中悟出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和合法性。马克思曾经是黑格尔左派,他继承了黑格尔的真实的人性只能存在于普遍性中的学说,但他只承认人的社会性、阶级性,而不承认所谓的国民性。马克思揭穿了黑格尔的国家神话,指出国家利益不过是统治阶级利益的一种掩人耳目的说法。^②

到19世纪中后期德、意统一之后,国家利益这一“现实政治原则”已经压倒欧洲文明的普世价值观,成为欧洲国际关系舞台上唯一一起支配作用的概念,“国家主义”开始作为主角登上国际政治的舞台,并上演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政治游戏:一方面,国家主权成为至高无上的存在,在其为人权服务的同时,也在不断地发生异化,

① [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253页。

② 何家栋:《国家利益与国家安全——兼驳国家主义意识形态》。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网站, <http://www.bjsjs.net/news/news.php?intNewsId=20>。

成为人权的奴役者,国家机器成为资本主义海外扩张的有利工具,成为弱肉强食的利器。另一方面,以国家等大义名份为由对个人的压迫也伴随而生。国家主义发展到极端便是法西斯主义,后者的警言是:一切为了国家,国家不容反对,国家无所不包。一战、二战是国家主义走向法西斯主义的高潮,以国家为单位的世界性战争和国家有组织的暴政,甚至超过了中世纪神学时代所招致的灾难记录。法西斯主义的克星和终结者是马克思主义和威尔逊主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结成的联盟。二战结束后,“国家主义”这个神圣的利维坦,日益受到理性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审判。

“国家主义”在日本的命运亦不例外。明治时代是日本确立现代制度和基本精神原则的奠基时代。明治精神经历了多难的选择,最终形成了国家主义、平民主义和自由主义的三位一体为基本内容的时代和民族精神。但其中居于支配性地位的,始终是国家主义,而产生国家主义的根源,则是压倒一切的民族主义诉求。众所周知,明治时代的日本和中国一样,同样面临西方的侵略和压力。因而,所有人关注的首要问题,是摆脱西方列强强加的不平等条约,实现国家的独立自主,进而实现国家强大。对于实现这一目标的途径,大多数日本人几乎不假思索地选择了“国家主义”。松本三之介在《国权与民权的变奏》^①一书中认为,这种国家主义分为两个层次。上层是官方的国家主义,“主张以政府为主导,旨在以强化政府法律、经济、军事职能为核心形成国家,要求国民各安其分,无条件地爱国”,这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国家主义。这种国家主义体现于政体上,就是强调扩张政府权力,以使国家可以动员一切社会资源,而在精神上,则要求国民无条件地为国家牺牲自己。另一种国家主义则是自下而上的,平民主义和自由主义所主张的,就是这种国家主义。他们确实要求国家给国民以自由、权利,要求

① [日]松本三之介著,李东君译《国权与民权的变奏》,东方出版社2005年版。

建立议会民主制度,呼吁破除传统观念束缚,实现精神自由。但他们所看重的并不是个人自由和民主制度本身的价值,而是其推动民众形成国家意识、帮助国家动员社会全部资源的功能。所以,狂热的民族主义者就不用说了,即使是那些追求自由民主的人,也不把伸张民权本身视为目的,他们心之所念的也是国家的强大。因而,个人自由与民主制度就只能是权宜之计。只要国家利益需要,就可以打折扣,或者完全放弃。

战前日本在法律和政治学研究方面受德国的国家学说影响很深,德国的国家学说是封建集权主义与资产阶级相调和与相妥协的产物。在日本天皇制形成过程中,为了使以天皇为中心的复古主义与自由民权运动相融合,日本对德国的国家学说给予了密切的关注。日本的第一部宪法——《大日本帝国宪法》就是以德国宪法为参考,在德国法学家若埃斯奈尔的指导下完成的。日本对国家主义的选择、思索和实践,使国家主义完成了在东方的扩展,获得了独具日本特色的内容和表现力。尤其是在完成了将“国体”和近代国家的一番嫁接后,国家的形态开始呈现出了大和民族的风格和相貌。如明治三十八年井上哲四郎在他的《国民道德概述》中指出国体的特点:1. 国体、政体分离;2. 忠君爱国一致;3. 皇室居国民之先;4. 崇拜祖先;5. 家族制度体系;6. 君臣分明;7. 国民统一为一体。^① 由井上为代表的“国体论”在明治以后的大正时期以及昭和前期一直作为国家的国民道德原理(实际上是国家主义道德原理),具有很高的权威。最后终于发展成为超国家主义思想。

对国家主义进行本土化改造后,国家主义便开始在日本甚嚣尘上起来。随着国家主义在日本的建国中不断地高奏凯歌,取得一个又一个的伟绩,国家主义对统治阶层与民众的说服力得到不

^① 《国体思想的发展》, www.hozyo.com/cangjing/ribenchuantong/002/004.htm。